

老年人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张楠 林志建 杨琳

摘要: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是缩小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分析来自政府-社会-家庭的多层次转移性资金在降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的效果。研究发现:(1)多层次转移性资金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家庭与社会的占比分别为71.59%、28.26%和0.15%;(2)老年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约为0.64,政府、家庭与社会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80.09%、19.80%、0.11%;(3)养老保险制度差异造成了养老金收入鸿沟,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对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作用有限,而家庭养老防老模式效果显著。据此,需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捐助渠道,鼓励家庭养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老年人收入差距 转移性收入 共同富裕 基尼系数分解 再中心化函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2)05-0060-10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2.05.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但是市场初次分配不公与收入再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过大对居民生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为缓解收入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精准扶贫等

政策,消除了绝对贫困,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并进一步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老年人数量和占比不断提高。同时,由于工作能力的下降,劳动性收入骤减,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其收入与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群体生活状况差距较大,部分老年人可以依靠来自政府和

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实现生活富足,能够安享晚年;同时也存在部分老年人没有或者仅享有极其微薄的养老金,因此生活拮据,甚至处于相对贫困的处境。老年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必将影响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缓解老年人收入差距,是缩小整体收入差距、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路径。

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政府、社会与家庭内部的多层次转移性收入。政府层面的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收入和政府直接补助。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养老金收入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多轨制”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导致养老金收入差异巨大。为了保障基本生存权,政府对处于贫困的老年群体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但覆盖范围较小,补助标准不高,仍无法满足贫困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社会捐助作为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之一,起到弥补政府层面转移性收入不足的作用。社会捐助在消除或者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捍卫公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宣传力度不足、捐助渠道尚不成熟以及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不高等原因,导致社会捐助规模偏小、精准性也较低,对老年人收入影响不大。政府层面转移性收入制度与社会捐助制度的缺陷,导致老年人需要依靠家庭成员的转移性收入来维持生活,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成为老年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问题,需要从政府、社会和家庭层面考察转移性收入对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

本文基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探讨如何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首先,统计了老年人转移性收入来自政府、社会和家庭三大层次的份额;其次,测算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并评估不同收入来源对我国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

距的贡献;再次,估计养老保险制度、政府直接补助、社会捐助和家庭养老模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依据估计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很多学者使用指标分解方法来分析各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多数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方法均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加以构建。Oaxaca最早提出了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分解方法^[1],之后不同学者均基于收入决定方程构建了不同的分解模型。较早的研究是依据线性回归,估计各个变量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变量标准差、变量与收入的相关系数和收入标准差,计算得出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2]。为了适应收入决定函数形式和衡量收入差距指标的多样性需求,以及更好地处理常数项和残差项对收入差距贡献的问题,Shorrocks提出了夏普利值分解法^[3]。相比之下,Firpo等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提出的收入差距测度方法,可以有效弱化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和反向因果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优势还在于可以测算无条件局部效应,估计结果更加稳健^[4]。

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差距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在政府层面的公共转移支付领域,主要包括两类文献。一类文献主要聚焦于养老保险制度。有学者测算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多轨制”^[5]、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水平与覆盖率^[6],对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影响。另一类文献主要针对公共转移支付体系中的低保政策展开研究,聚焦于其减贫效果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学者们评估了农村低保对实保样本、总样本与应保样本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7],识别了基本养老保障与社会救济的协同机制对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8],测算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试点项目的减贫效应^[9]。社

会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的理论探讨以及对社会捐助制度质量欠缺问题进行理论研究^[10],也有学者从地区经济水平、社会资本和社会捐助制度完备性,实证分析社会捐助制度对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的影响^[11]。家庭层面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测算了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能否弥补“社会养老”模式的不足^[12],发现“家庭养老”模式普遍存在,且起到缓解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13]。最新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多种再分配财政工具的综合作用,比如分析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三种再分配工具^[14],政府、企业、居民多层次转移支付系统^[15],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综合研究老年人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文献比较少。

本文可能的贡献是:(1)研究对象上,聚焦老年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并将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分解为三个层次,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分别考察政府、社会、家庭层次的转移性收入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贡献;(2)研究数据上,采用CHARLS2018微观数据,充分运用丰富的老年群体转移性收入信息,特别是老年人养老金收入与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相关数据;(3)研究方法上,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弥补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分解方法对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等局限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项目2018年数据。选取的样本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删除了缺乏有效观测信息样本后,整理得到10485个有效样本。

本文将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分为政府的转移

性收入、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和社会捐助三个层次。其中,政府层面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和政府直接补助,养老金收入具体指老年人所领取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养老金),本文将新农保、城居保和居民养老金统称“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直接补助具体有农业补贴(退耕还林和农业补贴)、低保补助(五保户补助、政府救济金和贫困户补助)。社会捐助主要是指老年人获得来自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团体,无偿自愿捐赠财物的折现值。家庭内部转移收入主要包括来自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比如生活费、支付的电话费、房贷、房租,也包括提供的粮食、衣服等物品的折现值。

由表1的统计发现,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分项中养老金人均收入最高,家庭内部转移的人均收入较低,说明老年人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养老金收入。老年群体中获得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的比例较小,补助和捐助对老年人收入的贡献有限。根据转移性收入细分项目的统计结果,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但是相比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其人均养老金收入偏低,金额只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收入的10%左右。家庭转移性收入中,子女提供了大部分的经济支持。政府直接补助中,农业补贴占比较高,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惠农政策相关,但是获得低保补助的老年人占比仅为2%左右。

(二)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Lerman和Yitzhaki提出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分解方法,将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分解为几类子项,进而对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进行分解^[16],总体基尼系数分解公式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金收入	10741.26	17270.23	0	276000
行政机关单位退休金	48223.36	22425.2	960	128400
事业单位退休金	45778.60	20681.85	816	132000
企业职工养老金保险	31062.00	13963.14	0	276000
城乡保、新农保、城居保(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2265.55	4368.78	0	103680
政府直接补助	3081.85	47968.46	0	3000000
农业补贴	1049.71	7656.76	0	400000
低保补助	3881.58	12001.82	0	280000
家庭转移性收入	4428.32	9184.71	0	380300
父母的转移性收入	3583.26	11644.08	0	100000
子女的转移性收入	6342.39	12640.78	0	380300
兄弟姐妹的转移性收入	2275.63	4692.542	0	83000
社会捐助	4989.07	21264.56	0	160000

$$G_0 = \sum_k S_k \bar{G}_k = \sum_k S_k G_k R_k \tag{1}$$

S_k 表示第 k 类子项收入在老年人转移性收入中的比重; \bar{G}_k 为第 k 类子项收入的伪基尼系数^[17]; R_k 为第 k 类子项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相关系数; G_0 为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

假设 G_e 为每个样本的第 j 项收入发生变动之后的基尼系数。我们假设第 j 项收入发生轻微变动,因此不改变该项收入的集中率(伪基尼系数 \bar{G}_k),从而得到:

$$G_e = \sum_{k=1}^K S_k(e) \bar{G}_k \tag{2}$$

下面评估第 k 项收入变动时基尼系数的变动,两端取极限可得到第 j 项收入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的边际影响为:

$$\lim_{e \rightarrow 0} \frac{G_e - G_0}{e} = \frac{\partial G_0}{\partial e_j} = S_j (\bar{G}_j - G_0) \tag{3}$$

由此,基尼弹性系数如下:

$$\eta_k = \frac{1}{G_0} \frac{\partial G_0}{\partial G_e} = S_k \left(\frac{\bar{G}_k}{G_0} - 1 \right) \tag{4}$$

式(4)表示,第 k 类收入每变动 1%,则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变动 η_k 。

2. 影响因素 RIF 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 Fripo 等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18],提出的收入差距测度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弱化由于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等原因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更为稳健。RIF 函数表示为:

$$RIF\{y_i, v(F_y)\} = IF\{y_i, v(F_y)\} + v(F_y) \tag{5}$$

Fripo 等运用 RIF 方法,估计自变量 X 微小变化对统计分布 v 的无条件部分效应(unconditional partial effect)^[19]。将 $E[RIF\{y, v(F_y)\} | X = x]$ 作为 X 的被解释变量,进行 OLS 回归,并取无条件期望得到:

$$v(F_y) = E[RIF\{y, v(F_y)\}] = \bar{X}\beta \tag{6}$$

其中, \bar{X} 表示 X 的无条件均值。

当统计量 $v(F_y)$ 选择基尼系数、分位距等指标时, β_k 表示 x_k 中 K 因素的总体均值变化对总体不平等性的影响程度。本文参照 Fripo 等提出的不平等指标,采用基尼系数等多种不平等指标衡量影响因素 RIF 回归结果,以便对比分析。



四、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分析

(一)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

基于政府、社会、家庭三个层次,分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经统计,老年人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较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6437,具体分解结果见表2。

1. 政府层面转移性收入差距

政府层面转移性收入份额、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71.59%、80.09%和0.0849。其中,养老金收入份额、基尼系数集中率、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68.47%、74.17%、78.90%和0.1043。可见,老年人大部分的转移性收入由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但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多轨制”,导致养老金收入鸿沟,且对收入差距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直接补助占比约为3.12%,基尼弹性系数为-0.0193,表明政府直接补助聚焦于少数贫困老年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覆盖范围较小,但是对收入差距起负向调节作用。

在养老金收入中,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收入所占份额为38.87%,基尼系数集中率、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79.67%、48.11%和0.092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份额最大,对基尼系数贡献较高。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所占份额为18.85%,基尼系数集中率、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90.92%、26.63%和0.0777。由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较高,其养老金待遇的集中率指数普遍高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所占份额、基尼系数集中率、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10.75%、24.93%、4.16%和-0.0659。因为缴纳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费较低,以及国家统筹账户资金有限等原因,导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待遇整体较低,对收入差距贡献较小。政府直接补助中,农业补贴和贫困户补助占比均不高,其集中率指数分别为0.2296和0.2765,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很小,仅为0.0720和0.0047,且均对收入差距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是由于补助范围较窄、救助标准不高所致。

2. 社会层面转移性收入差距

社会捐助对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影响偏小。

表2 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内部分解结果(G=0.6437)

收入分项	S_k	G_k	R_k	\bar{G}_k	v_k	η_k
养老金收入	0.6847	0.7749	0.9572	0.7417	0.7890	0.1042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收入	0.1885	0.9636	0.9435	0.9092	0.2663	0.0777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0.3887	0.8837	0.9015	0.7967	0.4811	0.0924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0.1075	0.7338	0.3398	0.2493	0.0416	-0.0659
政府直接补助	0.0312	0.8799	0.2796	0.2460	0.0119	-0.0193
贫困户补助	0.0109	0.9744	0.2838	0.2765	0.0047	-0.0062
农业补贴	0.0203	0.8776	0.2616	0.2296	0.0072	-0.0131
社会捐助	0.0015	0.9977	0.4725	0.4714	0.0011	-0.0004
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	0.2826	0.6735	0.6697	0.4510	0.1980	-0.0846
子女的转移性收入	0.2653	0.6816	0.654	0.4458	0.1837	-0.0816
父母的转移性收入	0.0034	0.9964	0.7235	0.7209	0.0038	0.0004
兄弟姐妹的转移性收入	0.0139	0.9568	0.5087	0.4867	0.0105	-0.0034

社会捐助占比约为0.15%,基尼系数集中率、贡献率和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47.14%、0.11%和-0.0004。虽然社会捐助能够提高贫困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是社会捐助力度有限,捐助规模偏小,因此所占收入份额偏低,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贡献很小。我国于2020年已经完成消除极端贫困的伟大历史成就,但是老年人由于劳动能力较低等原因更加容易返贫,因此有必要提升对相对贫困老年群体的直接救助力度,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持和救济贫困老年群体。

3. 家庭层面转移性收入差距

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是老年人转移性收入的重要补充,但是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不大。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的分项中,来自子女的转移性收入占比达到26.53%,基尼系数集中率为0.4458、贡献率为18.37%,基尼弹性系数为-0.0816。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是老年人维持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子女给予老年人的转移性收入差异不

大,因此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我国素有“养孩防老”的传统,绝大部分子女承担了老年人的赡养义务。

(二)转移性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分解结果,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衡量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转移性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影响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包括:老年样本领取的养老金收入、拥有工作的子女数量^[20]、是否得到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等,且控制了其他主要因素。为方便解释估计系数,将不平等指标估计参数扩大100倍,采用多种收入不平等指标模型进行估计,其结论基本一致,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第一,政府层面制度因素。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对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均值提高,均会导致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具体来讲,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收

表3 老年人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因素RIF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90-10)分位收入占比比率×100	(90-10)分位比率×100	(90-10)分位收入对数差距×100	对数方差×100	基尼系数×100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收入	0.7263*** (10.95)	0.1300*** (14.00)	0.0070*** (24.36)	0.0080*** (32.78)	0.0008*** (7.18)
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	0.3437** (2.44)	0.0625*** (4.89)	0.0057*** (11.66)	0.0068*** (17.02)	0.0003 (1.02)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0.3588* (-1.75)	-0.3237*** (-6.72)	-0.0033*** (-3.22)	0.0010 (0.97)	-0.0006* (-1.94)
政府直接补助(获得补助=1)	-2057.0775*** (-2.64)	-1899.2962*** (-6.98)	-29.2099*** (-6.18)	-24.2729*** (-3.48)	-3.4951*** (-6.47)
社会捐助(获得补助=1)	-2204.4990 (-0.75)	-1282.6100 (-1.34)	-8.5783 (-0.46)	-23.2126 (-0.79)	-3.0590* (-1.67)
子女工作数量	-1194.2537*** (-4.20)	-620.5536*** (-6.42)	-9.1516*** (-5.16)	-15.1088*** (-5.45)	-1.0120*** (-4.15)
常数项	10695.8230*** (7.59)	5721.2650*** (16.50)	354.5450*** (51.60)	201.5460*** (20.06)	66.0796*** (33.70)
Aver RIF	9547.90	3518.10	357.01	203.53	64.29
观察值	10485	10485	10485	10485	10485
R-squared	0.2192	0.1975	0.3384	0.3287	0.2943

注:回归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估计,且所有不平等指标参数调整100倍;* p<0.1,** p<0.05,*** p<0.01。

人、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均值提高100元,将分别扩大老年人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约0.1244%和0.0467%。其他收入不平等指标的估计结果与基尼系数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例如,最富有10%的老年人与最贫穷10%的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分位比率、分位收入对数差距以及收入份额占比比率均显示收入差距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相比之下,居民社会养老金收入均值提高100元,将有效缩小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约0.0933%。

政府直接补助对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作用显著。如果政府直接补助覆盖率提高10%,将降低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约0.54%,对数方差下降了约1.19%,其他收入不平等指标显示,同样可以有效缩小老年群体的收入差距。政府直接补助主要针对社会最贫困家庭和个人,该政策可以有效提高贫困老年群体转移性收入水平,从而有效缩小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

第二,社会层面因素。提高社会捐助覆盖率能够起到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获得社会捐助样本提高10%,基尼系数将下降约0.48%。其他收入不平等指标同样显示社会捐助起到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与样本中获得社会捐助的老年人样本较小有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捐助,扩大社会捐助的覆盖率,将有助于进一步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

第三,家庭层面因素。拥有工作的子女数量增加显著缩小了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增加一位拥有工作的子女,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将下降约1.57%,对数方差下降了约7.42%,最富有10%区间的老年人与最贫穷10%区间的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占比比率下降约12.51%。同时,最富有10%分位的老年人与最贫穷10%分位的老年人转移性收入的对数差距、分位收入比率也同样

下降。这说明我国家庭养老普遍存在,鼓励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整体上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践行我国养老金制度逐步“并轨”,是缩小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庭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履行赡养义务,以及扩大政府直接补助、社会捐助覆盖范围也是缩小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

(三)不同分位数收入占比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低收入老年群体收入占比,或者降低高收入老年群体收入占比是缓解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为实现精准施策,有必要更加细致分析不同分位收入下,影响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及其影响效果的差异,为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其结果如表4所示。

处于最低15%分位区间的老年群体,在提高各类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均值后,均降低了该区间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占比,可能的原因是处于该区间的老年人没有获得养老保险收入。相比之下,提高政府直接补助覆盖率、社会捐助覆盖率和增加工作子女数量,显著提升了该区间老年群体收入水平,说明最低15%收入区间老年群体更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补助,也更依赖家庭供养。

处于50%至65%分位区间的老年群体,在提高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均值,或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均值后,均降低了该区间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占比。相比之下,提高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均值、政府直接补助覆盖率、社会捐助覆盖率和增加工作子女数量显著增加了老年群体转移性收入占比。处于50%至65%收入区间老年群体大多数享有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依然是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的受益群体,同样也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

处于最高30%分位区间的老年群体,在提高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均值,或者职

表4 不同分位数收入下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RIF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最低 15% 收入占比× 1000	50%–65% 分位收入占比× 1000	最高 30% 收入占比×1000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收入	-0.0006*** (-31.79)	-0.0029*** (-14.73)	0.0058*** (2.75)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0.0005*** (-15.67)	-0.0016*** (-4.01)	0.0020 (0.43)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	-0.0001 (-0.93)	0.0022*** (2.86)	-0.0098*** (-3.74)
政府直接补助(获得补助=1)	1.9594*** (3.96)	10.5473*** (4.92)	-32.9379*** (-5.52)
社会捐助(获得补助=1)	1.5773 (0.87)	21.1861** (2.30)	-60.6526*** (-2.87)
子女工作数量	0.8678*** (4.91)	3.2935*** (3.90)	-10.7586*** (-3.39)
常数项	10.5606*** (16.11)	66.7142*** (16.77)	760.9349*** (21.88)
Aver RIF	9.5373	68.579	728.37
观察值	10485	10485	10485
R-squared	0.3402	0.2677	0.2335

注:回归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估计,且所有不平等指标参数调整1000倍;*p<0.1,**p<0.05,***p<0.01。

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均值后,均增加了该区间老年群体转移性收入占比。然而,提高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均值、政府直接补助覆盖率、社会捐助覆盖率和增加工作子女数量,显著降低该区间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占比。最高30%收入区间的老年群体不是政府直接补助、社会捐助的对象,基本不依靠家庭养老,主要依靠养老金维持生活。

不同分位数老年人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低收入老年群体更多依靠家庭子女的经济支持、政府直接补助以及社会捐助;高收入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养老保险收入维持生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分析来自政府-社会-家庭的多层次转移性资金在降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的效果,主要结论如下:老年人的转移性收入中,政府层面的转

移性收入份额达到71.59%,社会捐助比例仅为0.15%,家庭层面的转移性收入占比为28.26%。老年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6437,来自政府、社会、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分别为80.09%、19.80%和0.11%。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因素分析发现,政府制度因素中,养老保险制度差异造成养老金收入鸿沟,提升居民社会养老金收入的均值、提高政府直接补助覆盖率,均能有效降低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家庭因素中,增加工作子女数量,有助于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社会因素中,社会捐助覆盖率的提高同样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具体分析不同分位数老年人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发现,提高子女的经济支持,提升居民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和覆盖率,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占比。逐步减少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特别是推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将有助于缓

解老年人收入差距。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完成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政策目标。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水平差距,同时扩大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鼓励企业和职工依法购买养老保险。积极推进全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统一,协调省际之间基础养老金的分配,避免省际间老年人基础养老金差异过大。

第二,完善低保政策,扩大低保政策覆盖率,预防老年群体返贫。充分考虑我国农村老年人特殊情况,对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老年人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贴,如农业补贴政策。

第三,拓宽社会捐助的渠道,鼓励富人阶层对相对贫困家庭和个人的捐助,打通社会救助力量与贫困家庭、个人的沟通渠道。同时,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精准度,提升社会救助质量,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透明度,获得更多社会群体的信任,实现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救济贫困群体的重要力量。

第四,完善各项养老优惠举措,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鼓励子女在老年人养老问题上更加积极有为。例如,个人所得税采取家庭为单位,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将赡养老年人的家庭因素纳入专项抵扣范围内,同时考虑老年人收入差异,采取差异性抵扣政策,对没有养老金或者养老金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老年人,可以适当提高其子女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额。

注释:

[1]Oaxaca, R.L.,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 693-709.

[2]Fields, G. S. and Yoo, G., Falling Labor Income Inequality in Korea's Economic Growth: Patter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0, 46(2): 139-159.

[3]Shorrocks, A.F.,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3, 11(1): 99-126.

[4][18]Firpo, S., Fortin, N.M. and Lemieux, T., Decomposing Wage Distributions Using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s, *Econometrics*, 2018, 6(3): 1-40.

[5]贾晗睿、詹鹏、李实:《“多轨制”养老金体系的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发现》,《财政研究》,2021年第3期。

[6]周延、谭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老年群体收入差距变动视角》,《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解垚:《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及贫困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

[7]韩华为、徐月宾:《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来自中西部五省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8]焦娜、郭其友:《多维剥夺视角下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的识别与治理》,《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

[9]郑晓冬、上官霜月、陈典、方向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农村长期减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9期。

[10]谢勇才:《中国社会救助70年: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6期。

[11]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中

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2]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13]孙鹃娟:《中国城乡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及代际经济支持》,《人口研究》,2017年第1期;张烨霞、李树苗、靳小怡:《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

[14]卢洪友、杜亦谔:《中国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数量测度》,《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15]卢盛峰、陈思霞、时良彦:《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16]Lerman, R. I. and Yitzhaki, S.,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1): 405-410.

[17]具体计算过程参考洪兴建:《基尼系数理论研

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1~73页。

[19]Firpo, S., Fortin, N. M. and Lemieux, T., 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s, *Econometrica*, 2009, 77(3): 953-973.

[20]工作子女数量:是指务农、挣工资的工作、从事个体、私营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等子女数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1YJC79016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与财政政策干预:治理逻辑、效应评估与优化设计”(项目编号:72103166)。

作者简介:张楠,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1130;林志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1130;杨琳(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1130。

(责任编辑:朱耘婵)